

主编

王子尧

刘金才

夜郎史传

西漢之史記也。元夕，一派以之爲
白帝之子。元曰，白帝之子，月也。川江之
水，以之爲水。水，一派以之爲水。水，一派以之爲水。
水，一派以之爲水。水，一派以之爲水。水，一派以之爲水。

主编
著译者

王子尧

刘金才

山口八郎

王富慧

王春艳

李天元

杨伟



四川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世荣
封面设计 梅 曦
技术设计 席 玮

夜郎史传

YE LANG SHI ZHUAN

王子尧 刘金才 编译

*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码：610012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郫县犀浦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75 字数 390 千

1998年8月第一版 1998年8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 册

ISBN7-5409-2081-5/K·168 (民文) 定价：55.00 元

前　　言

《夜郎史传》这一家传秘本的发掘整理工作，早在数年前就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可是，面对这部民族文献中的巨著，由于时间、精力和其它条件所限，未能将其系统地译介出来，只是对其中故事性较强的少许部分以节译的方式奉献给关心和热爱民族民间文学的广大读者，这就是1990年我与康健、王治新、何积全等同志一起整理的《可保古城传奇》，并将其收录于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达思美复仇记》一书中。该书的三部分按严格意义上的分类应属民族民间文学的范畴，正如《可保古城传奇》其名，可谓民族民间传奇。传奇与史传自有其泾渭之别，这是不用多说的，故而在节译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民间文学常用的手法，以长短句意译加以文学修饰进行整理。同时，由于考证方面的原因，我们把其中一些尚待确证的人物名字予以暂译。如“武夜郎”、“武堵土”等在该书中出现时为武阿那、那阿宗。这一做法的目的乃是在考证尚未确凿之前不至于引起更多的争议。这也是我们一贯的治学态度。对此，我们在《达思美复仇记》一书的后记部分已留下了伏笔。

随着考证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在省、院领导的亲切垂询和有关专家的鼎力支持下，经过三年多的努力，长达三卷的《夜郎史传》终于以对译、注音、意译的方式整理出来，意译部分的字数均按原彝

文字数，未加任何修饰和整理者的个人想象。参与此书工作的同志都尽职尽责，实事求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可以说，整部书的翻译整理都是按唯物史观的原则进行的，尽量做到信、达、雅。

《夜郎史传》套书三卷，记载了彝族先民中武部族夜郎家支的历史；也记载有武部族中与夜郎有关的其他支系的活动情况。

《夜郎史传》中记述了夜郎家支的正宗谱系，指出夜郎的族源，出于古夷人武部族的武僰支，始祖僰阿蒙。夜郎的三世孙夜郎朵开始建国，兴起君长制，号称“夜郎勾起”。其时约当春秋中叶，其地在滇东北境。

僰阿蒙八世孙武阿古时，与武古笃部族联姻。居太液南岸。武古笃为今彝族阿细一支的先世。太夜，江河名，疑是汉书史书记载传说为竹王兴起的遁水。

僰阿蒙十四世孙鄂鲁默一代，君长、臣宰、毕摩三位一体，组成完整的统治机构。先与弭靡、武濮所二部联姻。后与彝族“六祖”的武、乍二支结合，从此更加强大，扩占四方土地，建都在可乐，时当战国中期。本卷《夜郎创基业》一章，记载武夜郎先攻占周围一些小部族的土地，接着起兵向日出之方，攻占东濮的古诺，继而挥师西向，夺下西濮的可乐，随又进攻漏卧不胜，撤兵回来建设可乐。在可乐南建八方殿、九层宫，外设九营十八卡。本卷《夜郎君法规》一章，记述夜郎王在可乐发布政治、军法、民法、刑法共二十条。书中记述夜郎王对内集权专制，对外四方攻伐，连年战争不休。今贵州省赫章县妈姑镇，距可乐约十公里，彝语称其地为“夜那妈谷”，义为“夜郎兵营”。书中描述此地当年的“军营广如云层，士兵多如羊群”，一天打七十二仗。说明夜郎国当年是穷兵黩武，战争频繁。

上述夜郎谱牒世系中记载鄂鲁默定都可乐之后，又曾东迁至大革落姆（在今安顺境内）。而在僰阿蒙十九世孙默遮索一代，夜郎

王又西迁，与濮甸联姻。相隔五代后的堵土弭，即僰阿蒙的二十四世孙，其住地是堵土弭谷（在今云南曲靖境）。可能是堵土弭是一代强君，又一度开辟了夜郎国的新天地，自称“天之骄子”，认为“天下惟我独尊”，被戴上了“夜郎自大”的帽子。

僰阿蒙二十七世孙莫邪费，是夜郎国的末代君长。彝谱记载当年灾星出现，妖怪逞凶，夜郎遭到攻打，政权灭亡。其残余军民，迁到哈弭，即滇西地区。然而，夜郎仅是其政权崩溃而已。其后彝族中有作洛举一支，是融入有夜郎后裔的。今四川乐山地区的彝族，自称“以诺人”，称言其祖代是从贵州去的。川南彝语是“以诺”方言，即保留了古夜郎的彝语方言。

《夜郎工匠史》一章，记述古夜郎地区有采矿炼铜和打矛、制盾的记载，也有修建宫庭和制造家具的记载，说明了当时的手工业生产水平。其它章节又记述夜郎君长与其它小国的战争中，都是争林地、抢牛羊，说明当时还是畜牧与种植结合的农牧业经济。

《夜郎在可乐》一卷，是用文学手笔描绘以可乐为活动中心的夜郎、堵土和漏卧家的阿苦、阿古连年战争以至最后罢战和亲的情节。先是武夜郎怀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认为要攻占漏卧的土地，得先把他胞弟夜堵土领有古诺之地兼并。于是假装有病，派两个差使到古诺通知夜堵土，叫他来可乐探病，想把他骗到可乐后将其杀害，兼并他的领地。却在夜堵土向使者询问其兄病状中识破其阴谋，便杀了二使者，起兵攻下可乐，擒住武夜郎，数落其罪过，然后把他囚禁起来。夜堵土便掌握夜郎的国家大权，治理得很好。随后有漏卧家阿苦君长兴兵攻打可乐，夜堵土领兵抵抗，采取诱敌深入而后围攻的战术，佯败后退，把漏卧兵引进可乐城后，立即反攻围城，俘获其兵将，捉住漏卧君长阿苦。堵土礼待阿苦，释放其兵将，治愈其创伤，归还其武器，倡导两家和好，不结冤仇。阿苦深受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争战了。然而回到漏卧本国，阿苦就

大受其妹阿古的责备，说他打败仗回来，丢了祖宗的脸面，要求把兵权交给她，再次出兵攻堵土。经多番争执，兄妹比武，阿苦比不过，让阿古统兵、厉兵，又出兵攻堵土。此次交战，却因堵土一看对方将领是个女子，轻敌麻痹，被阿古攻下可乐，堵土被俘。堵土对阿古固不服气，声言要杀便杀，决不认输。只要求不要杀害他的士兵和民众。阿古便说：“你释放我哥一次，我要释放你一回，两家互不欠帐，我们各自振军再战，比个输赢”。阿古放了堵土和他的兵将，班师回国，庆祝胜利，而后秣马厉兵，再次进攻可乐。堵土今番更加警惕，认真备战，严阵以待，最后战败阿古，把她擒住。阿古仍不服输，提出与堵土比武，若再比输了愿终身沦为奴隶。经过阿古与堵土比武三番，仍然比输，阿古才服气，愿听从堵土处置。堵土却以礼相待，向阿古求婚，并倡导两家和好，不再争战。阿古心悦诚服，表示拥护堵土的主张。并向堵土提出释放其兄武夜郎，还君位给他。二人成婚，离开可乐，经鲁勾（毕节）、博乍戈（大方）、古宗（黔西），到古诺（贵阳），转大革落姆（安顺）定居，在那里生儿育女，终其天年。书中又说武夜郎在复其君位之后，痛改前非，在可乐选贤任能，认真治理其国。后来，认为可乐再没有发展前途了，于是带领其家支和军队，在黔西北、黔中、滇东北、川南各地建设城池。这些城池分布在古夜郎地区。

夜郎其人，为彝族谱牒记载僰阿蒙三世孙夜郎朵。以后在人们对其称呼过程中，渐渐地人名变国名，进而人名与国名混称。书中所载的夜郎胞弟堵土，与夜郎性格迥异：一个好战，一个主和，是一对形象鲜明的历史人物。在彝族历史文献中对一些人物和事物的叙述，多是由彝族歌官（耄史——伴随君长办外交的歌师），来传诵或直接记载传世，最常见的记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谱牒世系为主线，叙述某个或多个家支的发展历史，另一种是以史实为主线，形象生动地描述一段历史事件或几个历史人物。无论哪一种，

一般都以史料为依据，以史实为背景。如《夜郎在可乐》就很明显地体现出这两种记载方式。

此书第三卷中，记述了夜郎属于彝族先民武部族。在春秋末年分支，形成武、乍、糯、恒、布、默六个支系，其为首的武，一般称为“后武”；而“六祖”以前分支的武，称为“前武”。武夜郎是渊源于前武而与后武结合的。本卷所记的彝族先民武部各支系，均为谱系记载武楚后裔与“六祖”中武、乍结合而成的一些支系。其它如武陀尼，即汉文献所载古青衣，源于古夷人尼部族。《西南彝志》记载“陀尼，尼之裔”。已记陀尼古代住进“尼知落姆”，即汉文献所载古青衣国的地址宜宾。汉文献中所载的滇王，即彝文献中所载的武德本，彝语称之为“德本武母”，义为“德本皇帝”。今昆明郊区有些彝族是武德本的后裔。武陀尼、武德本和其他一些武支系，与夜郎“同武不同支”。关于武夜郎及武部支系的活动，各地彝文古籍均有记载，只是各书记载的侧重点不一，详略不同而已。

《夜郎史传》的翻译整理，得到各级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支持，也引起了新闻界的高度重视。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目前不可多得的较为详细完整的关于夜郎的历史文献巨著。

编译者

1997年3月28日

序 一

余宏模

夜郎，是我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一个人多地广的“最大”实体。战国时期即已立国，它既是南方少数民族中大而显耀的实体，自有与此相应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应为中华民族绚丽多姿古代文化的部份，并是当今西南某些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夜郎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开疆守土，为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夜郎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是一个颇富学术价值的系统研究课题。唯其如此，对夜郎的研究受到了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界的重视和关注，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展推进，取得了多方面的收获。

二十年前，贵州学术界就曾经举行过两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就夜郎问题作过广泛的研讨，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如对秦汉时代夜郎的社会形态，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已处于奴隶制阶段，存在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及与它相应的上层建筑。对此时期夜郎地区各部的关系，也都认为存在着约定俗成的联盟，后由中央政权法定为等级分明的统率关系。对秦汉王朝开发夜郎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并认定夜郎与中原及巴、蜀、滇、楚、南越地区在政治和经济文化上早有内、外在的联系。在夜郎地区的交通问题上，对通向南越地区的主要水道牂牁江系今日何水？通向巴蜀的旱道经过主要

地点等，亦取得了趋于一致的意见。对夜郎的习俗大家认识略同，互为补充。

夜郎研究者们对夜郎问题虽然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取得某些趋于一致的成果，但对其中的族属、来源、名义、地理、后裔民族等问题，归根到底为资料条件所限，和研究方法不同，各抒己见而互存歧异，短期内尚难求得共识。

族属问题。诸家所论，有谢人说、仡佬族先民濮人说、越、濮、羌同为主体说、彝族先民说、百越说数种。持谢人说者，认为夜郎来自周代徐淮夷中的谢人。持仡佬族先民濮人说者，认为夜郎、牂牁皆僚人之居地，僚人呼竹为“盖脑”，即仡佬的异写，而僚人即古濮人后裔。持越、濮、羌同为主体说者，认为由周到秦汉百越系的僚人，南蛮系的濮人，今彝族先民的羌人，在夜郎地区都是主体民族。持彝族先民说者，认为夜郎由氐羌系的夷、僰、濮和百越系的僚人联合组成，夷在其中处于首领地位，即今彝族先民。持百越说者又分：一为百越濮僚等同说，认为夜郎族属为百越，而濮人和僚人就是对越人的一种别称。二为百越僚、濮两部分说，认为夜郎是由百越中按历史上的亲疏关系分为僚人和濮人的两部分组成。三为百越闽瓯骆说，认为闽、瓯、骆本越人共有的自称，在内部互为别称，夜郎地区各部名细究均含此自称之中。

来源问题。概言之有土著说和外来说两类。持土著说者意见有二：有的认为属仡佬族先民的夜郎濮人，本是贵州一带土著；有的则认为是由西周就存在于当地的古牂牁国，在春秋解体后，由该方国首邑夜郎邑近旁的一个小邑据有其故地发展而来。持外来说者，人数颇众。其中：有的认为夜郎可上溯到西周之世，周王室以徐淮夷的谢邑封申侯，谢人不堪压迫而迁到黔中；有的认为夜郎与东南越有存在同源关系，他们源出东南沿海地区；有的则说夜郎本江汉一带濮人，春秋晚期为楚人驱迫，迁入今贵州一带；有的认为夜郎

境内的夷人原住金沙江两岸。迁入滇黔毗邻的鸟蒙山区，征服濮人后扩向黔中。

名义问题。由于对族属、来源认识存在分歧，对“夜郎”的含义相应地亦有不同的解说。有持谢、浪说，释夜郎之“夜”乃“谢”之音转，“郎”古读如“浪”。是指溪谷之地，“夜郎”就是居于溪谷中的谢人。有的持僚人卜岁郎火说，认为古僚人中“有力者曰‘郎’”，卜岁郎火以夜晚作法，或即夜郎之称名来源。有的持源于山名说，认为古牂牁国首邑的今贵州安顺一带。左近有夜山、郎山，遂以“夜郎”名邑。有的持源于水名说，“夜郎”即彝语称谓的“以诺”，意为“黑水”，即金沙江。彝族先民“夷人”迁居于此，邑名“夜郎”。有的则以“越骆”为解，但互有小异。有的说夜郎的“夜”字疑即“于越”的“于”字，而“郎”与“骆”字音近，故“夜郎”乃“骆”的音译；有的说“夜郎”与“骆”，是越人语汇田野的缓、急两译，后来变音或异写作“僚”；有的认为夜郎群团的民族名称是“僚”，“僚”、“骆”同声而译写可通用，而“夜郎”最初只是其中一个部落的名称，后来凡是与之亲近者均被称为“夜郎”。

后裔民族问题。夜郎后裔为当代何族或哪些民族与夜郎有一定的源流关系，亦有数说：一是夜郎故地濮人遗民即今之仡佬族；一是夜郎境内夷人，即今彝族先民，其夜郎遗民后裔，即今彝族的“依诺”支系。有的学者认为，夜郎故土上的居民后来逐渐演变为仡佬族和布依族；有的学者又认为，现今的仡佬、布依、侗、水、壮诸族，与夜郎均有程度不同的关系。

地理境域。主要有相当于汉代牂牁郡一郡说和地跨包括牂牁郡在内的数郡说两类。一郡说的见解主要有三种：（一）夜郎之地为牂牁郡一县，南夷地区有数十部落与之地域毗连且族属相同，又以夜郎为首，故这一地区也是夜郎地区，汉时设为舍十七县的牂牁

郡；（二）以今地理论，夜郎部落联盟集体的地域东起今贵州黄平一带，西北至贵州毕节县，西至今云南罗平、路南、弥勒及华宁以东，北有今贵州遵义，东南包括都江上游地带，西南经今广西右江上游过云南文山州而达红河州东南，即汉牂牁郡辖境；（三）夜郎的领域为今黔西南、黔西北、滇东北、滇东南和桂北一带，亦在汉牂牁郡境内。数郡说的具体见解亦有三类：（一）夜郎不仅有汉代犍为、牂牁、武陵三郡之地，有时且越出此三郡之界；（二）夜郎在战国时的地域约当今贵州西部，今四川乐山、彭山、眉山、夹江也是古夜郎地，而西汉时的夜郎国境则包有犍为属县5个、牂牁郡属县8个和益州郡属县1个；（三）古夜郎国极盛时的疆域范围，不仅有今贵州全省，北和西北还包及川南、滇东北，南抵今广西田林、南丹，东到湖南新晃，西至今云南曲靖、陆良。即含汉牂牁郡全境及武陵、犍为两郡的一部分。

中心方位。对夜郎地区诸家所见均甚辽阔，并都认为应有一个起核心纽带作用的中心方位，此中心在于何部？有且兰部说和夜郎部说。持且兰部说者认为，牂牁郡的首府在故且兰县，它自然是夜郎部落联盟集体的中心，且兰君是夜郎中最大的王，其地在今贵州麻江、福泉、黄平一带。持夜郎部说者亦有四种不同认识：（一）夜郎中心在战国庄硚入滇和汉武帝时唐蒙入使夜郎两条路线的交切点上，即今贵州西南部的黔西南州及六盘水市一带；（二）夜郎中心即夜郎侯邑，应沿唐蒙所开陆道和牂牁江源流寻找，它在今云南东北角上的宣威、沾益一带；（三）夜郎的中心，只要确定了它所临的牂牁江于今天哪条水就能弄清楚，今西江及其上游江水河、北盘江即古牂牁江，现在的黔西南地区就是古夜郎的中心；（四）夜郎王国直辖地的地理位置不能仅从临牂牁江确定，还应从庄硚入滇路线、汉代犍为郡的设置、南夷道的修筑和邮亭的设立考虑，它在今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一带。

各家对夜郎整个地理范围的看法虽有不同，但十分明显的是都认为汉牂牁郡全部或大部分属县地，即今贵州省的绝大部分及与之相连的滇黔、黔桂交接地带属夜郎地区。对其中心所在虽似各持一端，但大多数论者不仅共有在汉夜郎国直辖地的见解，而且各自指出的具体地域大体趋向于在黔西北、滇东北、黔西南到黔南，均属夜郎王国直辖地。

综如前述，对古夜郎的研究虽有拓展但还须深入；虽有趋同但歧异尤多，还要经历充分运用现成的条件和创造新条件，在方法上还需解脱自我禁锢现象，博采众长，作多学科的综合探索。

在条件方面，最重要的是实物材料。就田野考古而言，据统计，从五十年代至今，贵州各地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夜郎时期文物总数已逾千件。这些发现，虽然尚不能够揭示出系统的夜郎文化，但已从不同角度标示了夜郎文化露出的端倪。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普安铜鼓山、赫章可乐及威宁中水等三个地点古遗址与古墓葬的发掘，三处发掘出土文物最丰富，地方特征也最突出。在贵州以外的夜郎故地或其边缘，如云南曲靖珠街、广西西林普驮等处，也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重要古遗存。为解决夜郎来源至关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遗存，在夜郎故地也都有多种发现。对现存的考古实物条件，需要作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同时，已知的地下出土材料是很有限的，今后还需加强田野考古，寻求更多准确有力的实物材料。

就文献材料方面，目前仍局限汉文文献而缺乏对民族文献的译著的研究。而汉文文献材料本身的困惑，也造成探求夜郎的歧异和困难。汉武帝时，司马迁作《史记》，首记夜郎。其后，班固在东汉章帝建初年间写成《汉书》，继采前史遗事，对夜郎作了续记。对《史记》，早在东汉时期，就有延笃因感“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辕，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

断句，难究详矣”（《史记索隐·后序》），乃作《音义》为之解说。对《汉书》，亦在东汉更有服虔、应劭等人开始为注。到魏晋南北朝时，不仅对《史记》、《汉书》注家蜂起，并有常璩、范晔、郦道元诸人以前两书系指趣略举、结约未伸，又分别撰《华阳国志》、《后汉书》、《水经注》，对夜郎的叙述由略显详。但这些后出之书与司马迁、班固之书有牴牾言辞。历代名家作注文尤显杂说纷呈。加以事过境迁，政区更改，山川易名，民族流徙时有发生，而史籍或版本前后增损衍缺，或其中汉文古今音义有变，或对少数民族称谓及语言译写各时期有异，致使后人对夜郎难以寻踪辨迹，需加对诸古籍所记和前人杂说，究诘稽考而辨正是非，判剖义理而显其虚实。

民族文献资料，据今所知民间口碑传说资料，在贵州一些少数民族，如布依族、仡佬族中都有关于夜郎的传说。但有自己民族文字记载流传下来的夜郎史籍，却只有保存在彝族聚居的乌蒙山区。如彝文巨著《西南彝志》等古籍，亦有关于夜郎世系及活动流徙的章节记载，曾译著公开问世。但是，较为全面完整记述夜郎史事的彝文古籍，则是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夜郎史传》，亦不愧是彝文文献中的煌煌巨著。

《夜郎史传》共计三卷，系彝文手抄本，抄本年代最迟不晚于清代时期。彝文古籍因多系世代传承，沿袭手抄收藏，故对原著版本、上限年代无可考据，更不详著者姓名及生卒年月。但究其记叙《夜郎史传》内容，详细记载了彝族先民中武部族夜郎家支的历史，也记载有武部族与夜郎有关的其他武支系的活动情况。举凡夜郎的源流、谱系、地域、城池、法律、经济、军事、政治、联盟、战争等等，都有详细具体的论述，它胜过某些汉文文献记载的简略缺遗，可以互相补充印证。它作为彝族古代史家留下的遗产，对夜郎研究蠭起诸说中的一家之言，也可供当今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对夜郎作多角度探索的借鉴，具有相当可贵的学术价值。

本书译著者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副译审王子尧先生，系出生滇黔毗邻乌蒙山区著名“芒部毕摩”世家，幼承家学，早年随侍其父王兴友老先生在贵州毕节彝文翻译组工作，后入中央民族学院深造，应聘在贵州民族学院任教多年，勤于译著，硕果累累，多次获奖，成绩斐然，为我省彝文古籍战线著名中青年学者。《夜郎史传》乃王子尧先生家藏秘本，经其本人数年辛勤耕耘，有关领导同志的关怀，和学者专家的鼎力相助，特别是为使彝文的译著准确无误，严谨规范，译著初稿邀请了省内著名的彝文古籍专家，集体逐卷审阅修定，尽了共同的努力，为了争取此译著能以高质量、高规格的精品呈献世人。

夜郎研究，方期未艾，诸多问题，尚待深入。《夜郎史传》的出版问世，为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和思路，新的资料和史实，有待研究者去鉴别取舍，发掘利用。谨此为序，并致祝贺。

1998年元月于贵阳八角岩下

序二

李廷贵

《夜郎史传》翻译整理成初稿时，我曾有幸拜读，并参加了三次讨论会。关于讨论的情况和对书稿的评价，诚如报刊和电台、电视台所报到的，这里不宜重复。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为《夜郎史传》作客观的评论。

为了增强民族自尊心，提高民族自信心，发掘、编纂和宣传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都是十分必要的。在中国，对于中华民族史是这样，对于汉民族史和各兄弟民族史也是这样。而要编写各民族的历史，除依据“书史”之外，还应该参考“心史”，只有这样，才较为公正客观而少些歪斜片面。

大家都知道，在写历史书的时候，要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凡是涉及到该民族的各种文字资料都须浏览、摘抄，然后整理成文，成书，这就是我说的“书史”，或者说“以书为证”。但仅限于此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依据“心史”，也就是该民族的史诗、传说、古歌，亦须发掘、整理，融于书中，使之更为丰满。外国史是这样写的，中国史也是这样写的，各兄弟民族历史也是这样写的，似乎没有特殊的例外。但个别史家却对“心史”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大笑话，所以这里才提出来讨论。

我们在编写《苗族简史》的时候，曾主张依据《苗族古歌》和《苗族史诗》，把“族源和迁徙”的起点放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但某

教授却说“那是弄笑话”，他肯定“苗族是贵州的土著”，“苗族所说的黄河就是贵州境内的鸭池河”。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书之成文准备发表（幸好没有发表）。后来，我们编写和出版的《苗族简史》以及《苗族历史与文化》等书，没有按照那位教授的观点，而是参照了范文澜等专家的“书史”，参照了《苗族古歌》（田兵、燕宝等翻译整理）、《苗族史诗》（马学良、今旦译著）和《苗族古史传说》（杨汉先译著）等“心史”。后来的“文化”出土和“马王堆”汉墓的女主人等等的考古发现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弄笑话”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位很个别的教授。现在《夜郎史传》也被某位教授嗤之为“大笑话”，他怀疑这部书的“内容的真实性”，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史料价值可言。我却认为《夜郎史传》是“书史”与“心史”融为一体史诗，这部史诗反映了“武部族夜郎家支的历史”，既有“书”（彝文古籍）之根据，也有“心”（英雄史诗）之根据，何况有贵州赫章的可乐等地的出土文物可以作证，怎么会是“大笑话”！？

可见，对于历史的研究，我们必须采取谦虚谨慎的态度，必须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决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也不能搞历史唯心主义。须知，“研究历史的人，方知历史是永远研究不完的”，“嘲弄历史的人，往往会被历史所嘲弄”，这是哲学家们的教训，我们不能不接受之一二。

以上是有感而发，在《夜郎史传》问世之际，让自己的观点亮相，一是推崇这部难能可贵的史诗，一是求教于大家，使其在百家争鸣中对民族历史文化之研究得到某些共识。至于我的这些浅见，算作序二吧。我作为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的高级顾问，有责任把专家们的成果推荐给读者。我相信，看过这些稀世珍品之后，读者自有公论。

1997年11月3日于贵州花溪河畔